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推动新时代文学评论工作的繁荣发展,8月26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文艺报》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编辑部在京举办“新时代·文学批评何为”学术论坛。20多位评论家、学者、文艺理论评论刊物主编在发言中总结近些年文学批评的成就、经验与挑战,并就如何切实增强批评的有效性畅所欲言。以下为部分与会者发言摘登。

——编者

## 强化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意识

□洪治纲



文学批评的理论意识,不是说文学批评需要以理论指导或介入,而是说批评家需要在批评实践中拥有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处于零散姿态,各说各的,互不认同,批评的聚焦度和共识度特别弱,失去了上世纪80年代那种敏捷性和凝聚力,既无法推动一些重要文学思潮的形成,也无法推动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探索。我将这个现象,概括为文学批评缺乏应有的共识意识。其结果,用南帆先生的话说,文学批评就像中国足球,谁见了都可以踢上几脚。

文学批评要不要肩负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职责?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一种文论的形成,一定不是从中外理论的自由旅行和相互嫁接中得来的,而是由文学创作在长期实践中慢慢形成的。它需要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紧密跟踪、批评、研判和总结,从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慢慢形成一种具有共识性的理论。它肯定不是几个人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众多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批评也一直保持着对这些创作变化的跟踪和研究,有些优秀的批评家也一直努力在进行理论提升,可惜缺乏共识意识,形成不了有效的当代文论。

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曾努力过。像中国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明显不同于报告文学,且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如何从这种写作中提炼一些有规律、有价值的理论,使之形成一种中国当代文论之有效部分?为此,我们曾与《当代文坛》《探索与争鸣》等刊物联合举行了多次研讨会,包括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非虚构写作与历史学中的口述史等比较性研讨。我们想从一些关联性的领域中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寻找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独特属性以及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在努力,但效果已慢慢显现出来,且有了一些共识度。

建构中国式的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文学批评其实负有重要责任。我们的文学批评,除了有效跟踪创作实践,可能需要强化理论建构的自觉意识。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学批评何为?”“如何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这确实是对每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就不断在思考:我写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功利地看,文字的效用是通过阅读实现的,那么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转化为更加具体的问题:是谁在看这些东西?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些东西的?

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共享同样的读者吗?或者说,文学批评会对那些阅读文学作品的非专业读者产生直接的作用吗?我是不大相信的。大概正因为此,我们才会思考“文学批评如何破圈?”“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

那么文学批评的读者是不是我们的作家?好的批评当然是能够与作者对话,并给作者带来裨益的,哪怕作者未必完全接受。这当然首先要要求批评是尊重创作的,能够深入体贴文本,理解作家,然后有所发现,有所提炼,有所创造,而不是把创作当作一个发言的由头,抛开作品去说一些自己说惯了的大话。因此无论流行什么样的批评风尚,我总是认为文本分析是文学批评的基础,离开文本的一切论述都是无效的。但不仅仅是文本分析,我始终认为作家对批评家最好的褒奖是:读了你的评论,我才知道我是那么想的。因为作家主要是以感性来面对这个世界的,这种感性里当然也有理性的成分,但是作家的思维不是条分缕析,而是以一种混沌而神秘的方式去打开那种灵光一现的时刻。

作家的所有理性思考,最终要靠容纳了诸多理性在内的拒绝分析的感性(而非浅薄的感性)去书写。而批评家的责任则是说出作家不能明确说出的东西,所以“读了你的评论,我才知道我是那么想的”绝非揶揄,也绝非是批评家在过度阐释,而恰恰是批评家的

## 倡导以理服人的批评文风

□贺仲明

接到“新时代文学批评何为”的议题,我马上想到,应该倡导一种以“否定性”为主导的文风。这首先是因为,就这个主题,我作为一家文学批评刊物的主编有很深感受,虽然提倡,但真正针对问题的批评文章很匮乏,非常期待真正有力量、有深度的文学批评文章,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编吴义勤曾经倡导过“灿烂苹果”,主编过相关丛书,来参加其刊物的活动,自然激发起这样的想法。

我本来用的是“批判性”,但考虑到“批判”一词太敏感,于是改为“否定性”。其实,我这里谈的“否定性”或者说“批判性”的含义是哲学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批判并非要确立某种不容置疑的‘元叙事’的独尊地位,或为某种现实生活中终极力量提供辩护,而是要厘定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界限,使之丧失唯我独尊的特殊地位。”其内涵是探索事物,也就是文学本身。所以,其基本批评方式不是赞美和肯定,而是更多客观分析,其中必然包含否定性论述。敢于真正面对问题,富有否定精神。敢于挑战权威,甚至不排除有一定的片面和偏激。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要求。2021年8月,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文艺评论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落实,是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发展文艺评论事业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文艺评论要注重导向性。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文艺批评思想引领、政治引领、创作引领、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文艺思潮,剖析文艺现象,坚决抵制低俗媚俗庸俗和泛娱乐化作品,坚持正确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注重文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



对于在一个时代或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批判或否定性文学批评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文学本无完美,中国新文学成长不过百年时间,缺陷很自然存在。从当前文学看,更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否定性”的文学批评针砭不足,体现出不同立场和视角,对作家有启迪,对读者有提升,具有充分意义。

正常情况下,否定性与建设性、批判与表扬完全可以共存,或者说,不同批评家有各自特点,不同场合可以采用不同方式。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以为,在当前文学背景下,需要特别倡导否定性的文学批评。包括评奖、发表等,都应该如此。

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太匮乏,太稀少,以至于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文学批评习惯于找优点,很少

谈缺点。对批评者、特别是青年批评家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对时代文学标准的确定也有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整个文学生态环境。因为,否定性的文学批评比表扬对作家更重要,能够让作家发现问题,至少是构成一种对话、提醒,是促进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式。只有以否定性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才能更好地起到促进文学钻研自我、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效果。

其二,在“表扬”批评盛行的背景下,养成了一些作家对针砭其不足处的文学批评很敏感,乃至反感。习惯于被表扬,被歌颂,却看不得真正的问题批评。当前一些作家,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存在过于自我、自恋的倾向——已经有不少批评家指出过。我以为,这种现象跟长期以来的不良文学批评风气有关。

当然,不是倡导意气之争,更不是倡导攻击和谩骂。批评要有其原则和要求:



其一,真诚,而且立足于文学。以文学为中心,或者说特别强调文学的独立内涵。以对文学负责、对文学热爱的态度从事批评,这样发自内心的、从文学出发的批评肯定会得到大家的尊重,而绝不是反感。

其二,批判立场与平和客观态度的统一,认识到文学标准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所以,既要敢于坚持自己,表达自己,也要有宽容精神。以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语气、表达不涉及作家个体,特别是私人生活。同时,要立足于爱护作家、鼓励作家的角度,不打击、贬斥,而是保持平和友善的态度。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导向性、针对性、建设性和说服力

□杨青

让文学批评真正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新时代文艺评论要注重针对性。要倡导批评精神和问题意识,敢于和善于“灿烂苹果”,努力成为文学创作的镜子和良药,通过逆耳忠言和苦口良药为文学创作“正衣冠”“治症结”。要大力开展专业权威的文学批评,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要敢于在艺术质量和水平评判上实事求是,敢于对各种不良作品、现象和思潮表明态度,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立场。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文学批评的首位,不唯流量是从,不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是审美问题就解决审美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让文学批评真正做到“坚持原则,直面问题,坚守底线,砥砺前行”。

新时代文艺评论要注重建设性。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文艺理论与

文学批评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在文艺批评理论和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运用中华美学精神。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要不断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努力形成“创作共识、评论共识、审美共识”。

新时代文艺评论要注重说服力。要以理论论、以理服人,倡导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科学全面的立场。要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把“自觉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地运用到文艺对象上来”,把坚持原则和尊重规律相结合。要在文学批评中坚持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坚持与人为善、以文会友的态度,坚持以理服人的方法,既拒绝“红包批评”又避免“上纲上线”,增强文学批评的战斗力、说服力、影响力,要秉持严肃客观、辩证全面的,同时也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评价态度,从而推动新时代文学批评切实做到“明辨是非,区分高下,褒优贬劣,激浊扬清”。

(作者系《当代文坛》主编)

## 文学批评为谁而写

□丛治辰

价值所在,那不但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而且更能够帮助作家提升自己的认识。

当然,世俗地看,文学批评对作家的价值一定不仅是文学层面的,而至少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考量。其一是市场的层面——文学批评是否是好的广告,能够帮助读者对一部自己没有读过的作品感兴趣,从而张扬作家的名声,推动作品的畅销。似乎本来应该如此。但既然我们已经承认现在非专业读者很少有人去阅读文学批评,则我觉得这方面的效用怕是相当有限。其二是评奖的层面,评奖当然有很多主体,有商业评奖,有官方评奖,也有文学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评奖。目前很多作家最在乎的大概还是部分奖项,文学批评对这样的评奖还是有一定影响作用的。这个作用看上去跟文学并不直接相关——好的文学作品很多,奖项终究是少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有偶然因素,难道文学批评只是为了这个吗?当然不是,但我认为不应小看官方奖项的肯定,更不应该小看文学批评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那些奖项的肯定,某种程度上在不断建构国家正典,建构我们民族和我们时代的审美趣味。因此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其实是以我们琐碎具体的努力,以我们的专业性,一点点参与到对民族审美和时代趣味的建设当中,形成国家正典的标准。这是应该让每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感到自豪的——有时候审美趣味不是靠作品,而是靠对于作品的阐释来生成的。对于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说,那些文学作品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了各种形态的文学批评(有时候图书的商业广告也应该纳入这种广义的文学批评之列)的介入,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一起,确定了我们这个国家文化形态的边界。

但最后我要说,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对象,还有批评家自己。文学批评为谁而写?归根结底是为自己而写。文学恐怕从来都不是最能攫取名利的事业,文学批评更不是,但这项事业却汇聚了那么多我认为相当聪明的人,我想促使他们为那些出色的文学作品写出一篇篇评论的最重要动力一定是热爱

文学的激情与初心。要保持这种激情和初心并不容易,那些坚固的东西总是会对文学构成挑战,哪怕在文学相关的领域也是如此。譬如在今天大学的中文系,进行学术训练一定比培养文学热情更加重要,在课表上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学术浓度很高、问题意识很清晰的课程,但是直接面对文学的鉴赏课程和文本分析课程却寥寥无几,甚至付之阙如。文本分析作为中文系的看家本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和文学理论的来源,并未受到重视。于是我们会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学生的很多论文问题意识看上去很好,很有学术抱负,但是一旦触及到文本,就分析不下去,无法用文本来支撑自己的论述,造成很多老师谈到的那种大而化之的文章。学生们直接从老师那里得到了学术黑话,甚至学术框架,却无法理解自己的师长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文本建立起富有独特风格的论述。当然,在教育层面之外,很多评价体系,包括发表制度,都在令文学批评失去文学性,失去理应有的活力,而陷入了既有学术话语的轮回。这个时候尤其应该回到自我,回到最初,回到文学本身,去书写与“我”、因而也与无数具体的个人有关的文学批评。我们不断在建设科学化的、机制化的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但是我想在所有的学科中,文学应该有其独特性,应该在无限追求客观的道路上,让文学批评成为感性的话语,如前所述,理性是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可是这种理性一定与物理学和化学有所不同。如果每个文学批评的从业者,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在为包括学术评价在内的外在之物写作,每个人都能诚恳地建构自己心中的文学正典,众多的自我才能够汇聚起来,构成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时代的审美边界。在此意义上,我觉得文学批评未必一定要破圈,也未必一定要因为新媒体时代而去采取什么新鲜的手段。能破圈的便去破圈,不能破圈的就在圈里面安静地写合乎自己性情的批评,这恐怕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来自于对凝固知识框架的超越。在学院化文学体制中,文学批评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面前似乎抬不起头来。作为文学常识,文学批评的主要工作是对文学现场源源不断运来的作品、现象作出迅速回应——甄别、分类、包装,以完成文学进入流通和再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在文学知识的生产流程中,文学批评被指定的是一个初加工位置。由于缺乏时间距离,文学批评提供的结论被认为有待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和深度构造。这套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常识其实来自于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的三分法,它虽被广泛接受,却不能被绝对化。换言之,在此之外还应其他的划分方式。比如黄子平教授就曾说过,所有的文学史都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循着这个逻辑,其实所有的文学理论也都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按照韦勒克的划分,文学批评平行但低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因为文学批评客观性不如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但按照黄子平的说法,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同样是一种主观的理论建构,它们也应被纳入大文学批评范围。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文学史的三分法来自于韦勒克,这是常态社会下的知识划分,大变局时代文学批评当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学批评呼唤着思想的诊断、审美的创造和现实的介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来自于它从固有的思想体制和凝固的知识中摆脱出来,去将一种未来的远景转变为现实。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来自于肯定性和否定性的辩证。文学批评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何处为好,何处为坏,这是一个判断力问题;报喜不报忧,表好不表坏。文学批评变成文学赞美、文学吹捧甚至文学谄媚了。文学批评有肯定性和否定性两面,但赞美未必就是肯定性批评,批判也未必就是否定性批评。有效的肯定和否定的本质都是准确的发现和创造。不准确的赞美和批判在艺术上都是无效的,既

##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来自哪里

□陈培浩

伤害文学,也伤害批评。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提倡赞美或批判,两者都是批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反对自吹自擂、相互吹捧、盲目拔高的无效赞美;也反对人身攻击、以偏概全、全盘否定、没有学理性的无效批判。无论是肯定或否定,有效的文学批评必定是价值的辨析和确认。否定性批评,灿烂苹果不是为了毁掉苹果,而是为了给苹果去烂存好。所以,否定性批评的目的同样是价值的确认,而不是价值的毁灭。肯定是为了将好的价值辨认出来,否定同样是为了去伪存真、去芜存菁。还需注意到,有效批评常常兼有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思维。即使是准确的赞美,也不是最好的肯定性批评。肯定性批评必须同时兼有否定性思维,换言之,寻美的批评固然有其道理,但只寻美而不求疵的批评,只能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不能在更宏大的视野中对作品进行准确的定位。否定性思维将使肯定性批评走向深入,反过来,肯定性思维也有助于否定性批评获得更高层次的学理性。解构有力,建构无方,这样的批评并非完全无效,但显然并非第一等之批评。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既要对作家作品有理解之同情,有效地肯定;也要能以更高眼光审视之、评定之。有一张更广阔的艺术地图,才知山外有山。对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有情,又能知其种类科属及客观的艺术位置。有一套更高远的艺术标准,文学批评才能与文学创作一道攀登更卓越的高峰。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来自于对多元标准的坚持。它的标准并非单一,不同类型的批评有不同的有效性标准,批评必须对读者有效,但读者却是各种各样,并非所有人都是全部文学批评类型的理想读者。对一个人无效的批评未必对所有人无效。按照批评对象和范围,我们可以将文学批评分为文本批评、现象批评和理论批评。通常而言,文本批评以单一或几个文本为批评对象,是文学批评最常见的形态。现象批评是对文学现象、思潮的批评,通常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理论批评则多进行诗学辨析和理论建构。事实上,这三种批评类型各有其意义,但却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比如对普通读者,甚至是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通常是文本批评,因为它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入文本。理论批评对于某些人而言可能是失效的,然而却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无效,这有赖于建构一种更加辩证多元的标准。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